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试论党建领域的几个重大关系

雷 云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1991年7月

试论党建领域的几个重大关系

内 容 提 要

当前在党建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认识的问题,思想理论的问题。为了克服前几年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在党建问题上造成的混乱,有必要对党建领域的五个重大关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从思想理论上澄清是非,正本清源。这五个关系是:(1)党的建设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2)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关系;(3)党政分开与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关系;(4)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与坚持党员标准的关系;(5)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

党的建设问题,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基本问题中之最基本的问题。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我们更应当痛定思痛,把党建问题提到首要议事日程上来,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

当前在党建领域,我们面临着大量的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制度的问题,政策的问题,实际工作的问题,但是,根本的还是认识的问题,思想理论的问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放松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却散布了许多歪曲党建理论的荒谬观点,党的前主要领导人也提出了不少背离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的错误主张,从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所以,为了搞好党的建设,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为指导,在思想理论上驱散迷雾,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统一认识。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关系问题上分清是非界限,统一思想认识。

一、党的建设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

早在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提出了如何使党更加布尔什

维克化的问题。他认为，党的建设从来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大问题。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同党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紧密相联。这是总结党的十八年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不能不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现阶段党的建设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处于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原则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做法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得不到保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做法，离开改革开放就无从体现。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环境中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这样，就决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新时期党的建设，就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下，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进行，保证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就失去了依托和基础。党的巩固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是否能正确坚持这条基本路线，特别是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处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只有把党建设好了，使党成为一个坚强的真正有战斗力的党，党才能更正确地坚持基本路线，特别是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好两个基本点的关系。这应当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十一年来，党中央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向全党阐明了党的建设的这个指导思想，所以从总体上说，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极其明确的。问题在于，党的前两任总书记没有坚持这个指导方针，在贯彻执行中存在着若干偏差，在两个基本点的掌握上发生了倾斜。尤其是党的前任总书记虽然言必称改革开放，却很少讲甚至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的思想深处，是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为多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影响和妨碍改革开放。如果按他的思路搞下去，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他的纵容、支持下，党内一些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与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相互呼应，沆瀣一气，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起劲地攻击四项基本原

则，要求把社会主义的东西统统改过去，把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放进来，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党内还有一部分同志受此影响，讲现代化建设往往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主词，而忘记了这个主词，就是忘记了事情的本质。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其中包括一些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干部，不能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划不清界限，有的在关键时刻政治上动摇，有的还直接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有的甚至成为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二是在相当一部分党员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忘了，个人主义膨胀，拜金主义盛行，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三是党内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日益发展，有的党员和党员负责干部甚至堕落成为经济犯罪分子。因此，党的先进性受到了挑战，党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党的战斗力受到了削弱。这些严酷的事实证明，党的建设一旦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势必对党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近几年来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做到：第一，对全党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把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第二，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来建设党，无论是党的思想建设还是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要围绕把党建设成为既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能坚持改革开放的党这样一个目标来进行。第三，党的各级组织在实际工作中，都要学会正确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在制定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总之，我们全党同志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现实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一切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个关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一切工作犯不犯错误，其根本界限就在这里。十一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基本经验教训，也在这里。今后我们党的事业是否能顺利发展并实现预期的目的，关键还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必有高度的自觉性，决不可以有丝毫的忽视和懈怠。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建设党，党一定要在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二、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关系

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四位一体的任务，它们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不可偏废。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特别是从我们党的历

史和现状来看，尤应把党的思想建设突出地放到首要的地位。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的核心和精华所在。进行党的建设之所以要特别着重于思想建设，首先因为思想建设是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决定党的性质的，不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而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党内非工人阶级成分的广泛存在，决定了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是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建设，但这是以党员的良好思想政治素质为前提的。党在历史上所以犯过多次“左”的和右的政治路线的错误，都是与党在思想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分不开的。即使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如果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不高，仍然得不到正确的贯彻。第三，党的思想建设又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前提。组织建设的目的是使党的组织始终保持纯洁，纪律严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从思想上启发、提高党员的觉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32页）第四，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关键也在于搞好党的思想建设。作风是由党和党员的世界观和精神面貌决定的。我们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只能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大公无私、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上。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来看，还是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来看，党的思想建设是始终起着保证作用的。当然，反过来说，党的思想建设也离不开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它有赖于这些方面的建设为它创造必要的条件。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的思想建设被放松了，特别是党的前任总书记严重忽视党的思想建设，甚至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实质上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否定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否定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在这种错误方针和口号的指导下，许多地方和部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撤了，阵地丢了，队伍散了，整个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日益泛滥起来，严重地侵蚀了我们党的队伍。近几年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发展，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发生，都是同忽视党的思想建设分不开的。

当务之急，就是要汲取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切实地把党的思想建设当作党的建设的第

一位任务来抓，并且抓紧抓好，一抓到底。党的思想建设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就当前实际情况看，特别需要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在全党系统地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并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其中，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对于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认真刻苦地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提高理论素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从当前情况看，组织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从事建设和改革，搞好各项工作，凭实践和经验就够了，不学理论照样过得去；有些同志认为，理论离现实太远，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具体问题，学了也没有用处；等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五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就着重批评了那种把党员埋头读书称作“学院派”，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的谬误意见。他指出，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理论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所以，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唯其如此，他认为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见解，是极其深刻和精辟的，而且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回顾建国以后的历史，我们党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同过去搞民主革命一样，缺乏理论上的准备。50年代开始，全党忙于处理大量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无暇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感到特别困难；随着党的胜利和发展，大批新党员进入党内，他们基本上没有经过理论的学习和锻炼。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多年来党在主观上放松了努力，所以虽然从中央来说，已经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许多规律性的了解，但是就全党的总体情况看，理论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够的弱点，仍然严重存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四十年中我们党的屡次失误，同样是指导上的失误，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到完全的胜利。现在，中央十分强调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尤其是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在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之后的今天，痛下决心把全党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件大事抓紧抓好。理论问题从来就是根本问题。政治上是否坚定，关键在于理论上是否坚定。要使全党同志在尖锐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本途径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使全党同志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

其次，要对广大党员突出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提高党员政治上识别自由化的能力，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由此决定：第一，我们国家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来确立、完善和发展；第二，我们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依据来制定、贯彻和实施；第三，我国各族人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来要求、约束和规范。一句话，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治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全体人民的神圣义务，更是共产党员的革命天职。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潮，它的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政治动乱的思想理论根源。如果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泛滥，就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直接来自国际共运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两者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因此，国内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可以被看成是整个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是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态度的最实际也是最重要的检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中央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变。但是，由于这种思潮有国际背景，有社会基础，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我们必须树立长期斗争的观念，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当前，我们要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以及它的思想理论基础——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新闻观、教育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继续逐一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澄清是非，正本清源。与此同时，还要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和党的前主要领导人的错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对党员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的教育，并且把这些教育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结合起来。

今天，党的思想建设面临艰巨复杂的任务。如果把上述两项工作做好了，就是抓住了思想建设的根本，也就为搞好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党政分开与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应当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而不是直接管理者。之所以如此，根据在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而不是行政组织或生产组织，党应当使自己充当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不应当使自己成为具体的事务管理机构。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指导力量”，党的使命是把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工人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统一起来，并且把它们行动引向工人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党是工人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掌握政权，管理国家，可是不能把这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越过政府而管理国家的。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与国家政权不是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必须实行党政分开。过去我们由于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条件，在领导体制和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其结果，一方面压抑了政权机关和行政领导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各级行政组织和生产指挥组织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又分散了党委的精力，妨碍了党委自身的工作，出现“党不管党”的状况，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据此，党的十二大、十三大都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的任务。所以，实行党政分开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理，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其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这几年来在逐步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在认识上和做法上存在某些偏差。一是把党政分开误解为党政分家，而不是把它理解为党政职能分开，因而使党组织对本来该管的事也不管了；二是把党政分开误解为降低党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因而使党组织缩手缩脚，不敢理直气壮地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其共同的结果，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借党政分开之名大做文章，妄图否定党的领导，而党的前任总书记又公然提出要淡化党的观念和党的作用，更使上述偏差有所发展。这种情况背离了实行党政分开的初衷，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威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当前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要正确理解党政分开，在继续实行党政分开的同时，坚持党的

政治领导核心作用。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从根本上说，也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重要的是必须重申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它的主要含义是：第一，党的领导应当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最根本的是依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行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政治方向的领导。党的思想领导，最根本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和道德精神，去武装广大党内外群众，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把他们的认识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上来。党的组织领导，最根本的是要健全党的组织，正确地选拔、分配、考核、监督党员和干部，通过他们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确保党的政治领导，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不致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党的组织领导，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党的思想领导，则是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党不仅要管路线方针政策，还要管思想，管干部。第二，党的领导应当是对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工作的全面的领导。党不仅要领导政治，领导军事，领导外交，领导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而且也要领导并且特别需要领导经济工作。我们强调党要管党，但是决不能把这理解为党只管党。如果认为既然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那么党委及其主要负责干部只要抓党建就行了，不必抓经济工作了，这是又一种片面性。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决定了经济建设是我们的最重要工作，是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新时期的最大的政治。经济的稳定，是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以及其他一切稳定的基础。因此，全党都要极端重视经济工作，各级党组织都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当然，党委抓经济工作，主要是抓经济工作的方向性问题、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的问题，而不是抓一些具体问题，更不是单纯地抓“阿拉伯数字”。第三，党的领导应当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的全面的领导。关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不言而喻，现在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我们党有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它们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否认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否认它们的战斗堡垒作用，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甚至实际上会否定中央的领导作用。

当前，在党政分开与坚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关系上，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理顺企业的党政关系。厂长负责制必须坚持，但是企业党组织也要起政治核心作用。厂长可以独立负责地处理经营管理、生产指挥、技术开发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在这些方面的作用；企业党组织作

为政治核心，则担负着搞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领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任务。根据这个精神，在干部问题上，企业中层行政干部应由厂长提名，或党委推荐，经党、政领导集体讨论后，由厂长任免。这就是说，企业党组织也要管理干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对此有过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党组织还是要管干部。党是政治领导的核心，离开了组织领导、思想领导，那个核心就是空的！”因此，关键在于使党政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如果在厂长、书记“谁大谁小”问题上争论不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四、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与坚持党员标准的关系

列宁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选集》第6卷第458页）陈云同志强调指出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为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奋斗”的口号。为什么把党员标准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呢？这不仅是因为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使命所使然，而且也是由党内生活发展的辩证规律所决定的。共产党的队伍不是铁板一块。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一些人锻炼得更坚强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些人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一些人经不起环境的考验而消沉、颓废；还有一些人则背叛革命，做了可耻的逃兵。这说明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及时教育和挽救那些可以教育和挽救的人，而把那些相形见绌乃至腐化变质的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是党的建设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直接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由于执政党的客观条件，使党内易于滋长各种不良倾向，而且动机不纯的分子混入党内的可能性也增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极大地败坏了我们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我们党存在一个要使党员合格的问题；由于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党员负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坚持共产党员的条件，为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奋斗，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特殊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但是，前几年在党的前主要领导人错误建党思想的影响下，坚持党员标准的问题也被严重地忽视了。他甚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党内产生腐化现象不可避免的论点，并且主张淡化党风的概念。按照这种论点，对党内腐败现象不必少见多怪，对党员可以降低要求。于是在一部分同志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例如

有的认为既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只能有初级阶段的党风，有的认为既然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那么让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也就没有什么害处，有的认为既然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标准就应当成为衡量党员条件的根本标准；如此等等。这些观点的流行，妨碍了党和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明辨是非，正本清源。

所谓初级阶段的党风论，实质在于认为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因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否认其取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而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只是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而不是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始终没有变，也不能变，从而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不会变，如果说变，只能是随着社会阶段的发展而变得更高更严。初级阶段的党风论是以社会发展阶段论党风的，按这种逻辑，过去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党风的标准应当是很低的，但恰恰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党和党员逐渐培育起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按这种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远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党风的标准应当比过去更高，然而初级阶段的党风论的实质却是要求降低党风的标准。所以，这种观点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单纯以社会发展阶段论党风，不是科学的方法。同时，根据初级阶段的党风论，什么艰苦奋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党的整体利益等等，统统成为过时的口号。尤其是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更成为令人发笑的“背时货”。但是，放弃了这些，还成什么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呢？而且，既然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党尚且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末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而不能对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呢？可见，所谓初级阶段的党风论，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的。

所谓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无言论，实质在于混淆政策允许的与党内提倡的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把党的政治生活降低到一般经济生活的水平。其实，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决定了党的一切活动，党的生活，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奉行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高度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种种特有的优点，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累、凝聚和升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党性。它表现为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宽阔的胸怀，高度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战斗的高度自觉性，等等。党的一切活动，党内的一切生活，都要以上述党性原则为最基本的准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确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为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惜作出任何牺牲的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理想、思想和精神，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但是，商品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不是理想，而是利益。商品交换实质上是等价交换，利益交换。没有利益的均沾，做不到交换双方互不吃亏，就谈不上等价交换。这一原则，无疑与党性原则大相径庭。如果按此办理，那么，第一，就谈不上理想，谈不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吃亏”精神和牺牲精神，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就会把党的原则也当作商品去交换，即“拿原则作交易”；第三，就会使党内关系变成庸俗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见利忘义，冷酷无情。这样，党就将失去先进性，失去群众，失去战斗力。所以，党性原则与商品交换原则，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而把商品交换原则完全排除出去。上述这种所谓“无害”论，是完全错误的。

所谓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党员条件的根本标准论，实质是抽去党员标准的政治内容，使党员只埋头于发展生产而不问政治方向。毫无疑问，由于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确认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义。党的十三大指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但是，生产力标准是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十三大论述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政治前提是十分明确的。同样毫无疑问，由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由于生产力标准是个根本标准，共产党员应当热心于发展生产力，为之直接间接地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必然地体现党的理想和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体现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何况实际上生产力标准往往被庸俗化了，变成了速度标准、产值标准、利润标准甚至赚钱标准。凡是会赚钱的就是好党员，连百万富翁也可以入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怪现象。因此，用生产力标准替代党员标准，结果只能是降低党员标准，助长非政治倾向，败坏党的声誉。

五、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为我们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党内滋生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我们还要看到，在无产阶级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剥削

阶级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舆论工具的情况下，腐蚀执政党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是社会衰朽、反动势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可行”也是最毒辣的手段。西方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妄图通过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达到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目的。党员和干部被腐蚀的过程，看来似乎在一部分人中缓慢地行进，但它是在经常地不间断地发生和发展着的。世界上任何事物和过程都是质与量的统一，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要是这种现象不受到有效的遏制，眼看我们党的队伍被一部分一部分地腐蚀掉，那么有朝一日就会导致整个党的变质。因此，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我们党只要自己的肌体是健康的，能顽强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那么国内外任何衰朽、反动势力都是不能摧垮我们的；相反，如果我们在“香风”、“糖弹”面前不堪一击，那么国内外衰朽、反动势力要搞垮我们的党就轻而易举了。

既然有腐蚀，就要反腐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党内反腐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斗争，是社会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的反映。党在这个斗争中的成败，对于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极大。几年来群众对党的埋怨和不满，主要就集中在党内腐败现象这个问题上。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反动分子所以能挑动相当一部分群众卷入动乱，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所以，我们要把坚决开展这场斗争，清除腐败现象，提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条道路斗争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当前有部分党员和干部，对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尚有种种疑虑，其中突出的是生怕这一斗争会挫伤一些人的积极性，妨碍搞活经济，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是把反腐败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其实，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反腐败斗争，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既然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那么反腐败正是它的内在要求。开展反腐败斗争，不仅不会妨碍改革开放，恰恰相反，正是为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廓清道路，创造条件。如果以允许党内存在腐败现象为代价去换取改革开放的发展，那么这种“改革开放”也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迟早会走偏方向。大量事实证明，所谓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给腐败现象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麻痹人们对腐败现象的警惕，放松党内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这是前几年党内腐败现象迅速蔓延，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

不能说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产生的种种问题，在我们这里都要出现一遍，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体现在哪里？一般地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也能做的事情。共产党人比资产阶级高明，就在于把改革开放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做，决不是给改革开放设置障碍，相反，正是为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政治保证。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在做法上，要把反腐败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有一些实际问题尚待解决。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正确地界定腐败现象的含义，划清一些大的界限，同时在政策和制度上要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党的十三大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起来了。“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为了使党能经受住这双重考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反腐败的唯一出路，是从严治党。所谓从严治党，不是什么别出心裁地另立章法，而是切切实实地按党章办事，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党员。对于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首先要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但是又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同时必须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姑息养奸。是不是这样做，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正如列宁所说的：“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列宁全集》第19卷第415页）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我们要在改革中建设党，党要在改革中前进。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责任，就是在新形势下，把党内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辩证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又要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革命性，保持党员队伍的共产主义纯洁性。

当前，我们党处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我们要如实地肯定党的状况的主流是好的，整个来说党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但是同时也要

清醒地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决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党的前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的危害。从思想理论上弄清上述五个关系问题，是三个“不可低估”的必然要求。只有在这些重大关系问题上认识统一了，才能使党的建设中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扎实的思想基础。